

名人轶事

宋庆龄与丁聪的一段动人佳话



宋庆龄与丁聪

位于北京后海原醇亲王府西花园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故居,经过一年多的改造,近日重新对外开放。在宋庆龄生平事迹展览中,有一幅布面宣传画引起记者的注意。这幅名为《逃亡》的油画作者竟是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现场展出的还有一张宋庆龄与这幅画作的合影。宋庆龄生平研究专家何大章向记者介绍了宋庆龄与丁聪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一段动人佳话。

宋庆龄是中国现代慈善公益事业的开创者。在抗日战争中,通过她的特殊感召力,为中国的抗战募集到大批经费和物资。宋庆龄十分重视宣传,她亲自选定的《逃亡》公益宣传画,就是

其中的一个典型实例。

从《逃亡》到《难民》

1931年“9·18”事变,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宋庆龄十分焦虑,多次与友人深谈,研究组织抗日运动的问题。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对上海的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身在上海的宋庆龄到吴淞前线巡视阵地、慰问官兵,创办国民伤兵医院,公开发表谈话,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日军炮击上海市区,淞沪抗战爆发。宋庆龄更是不舍昼夜为抗战奔走呼号。她当月就发表了长文《中国是不

可战胜的》,指出:在觉醒了中国人民面前,“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她积极向各国呼吁:大家必须一致起来制止日本的战争行为。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并领导了抗战救援组织“保卫中国同盟”。1939年1月,以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的“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在香港成立。这些组织成立后,急需开展有效的宣传,以尽快扩大募集款物的规模。

1939年4月,“中国漫画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香港中环中央戏院举办了画展。宋庆龄听到这个消息后,便亲自来到展场参观。

走到一幅名为《逃亡》的画前,宋庆龄停下了脚步。这幅画作表现了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一户中国农民。一位手提重物的老妇人,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一位牵着毛驴的男主人。四个人物的眼光朝向四个不同的方向,表现出极度的惶惑和迷惘。

宋庆龄满怀同情和不忍,神情凝重地伫立在画前。过了好一会儿,她说:“这幅作品很适宜印成招贴画,保卫中国同盟正需要它,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卖给我们?”“保盟”就这样买下了这幅作品,印制成宣传画,发送到世界各地。

在被“保盟”印成宣传画后,《逃亡》更名为《难民》。这显然是根据宋庆龄的意见。

这幅画深深地打动了宋庆龄。在她自己珍藏的原版照片中,有一幅是她站在已加好边框的《难民》画前的留影。如此郑重其事地对待一幅美术作品,对宋庆龄来说十分罕见。

《逃亡》是22岁青年画家丁聪的作品

1937年8月,日本大举进攻上海,局势日益严重。住在上海黄陂南路

的漫画家丁悚,不得不同意长子丁聪离开即将沦陷的上海。丁聪当时已经是《良友》画报社的美术编辑。他与又是邻居又是同行的张光宇、张正宇兄弟结伴,搭乘一条法国船去了香港。

这时,与丁聪同是邻居、同样从事美术工作的叶浅予正在武汉。他在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抗日漫画宣传队。当时,中国军人从日军俘虏身上抄出了很多照片。这些照片记录了日寇在侵华战争中奸淫烧杀、狂轰滥炸的种种暴行。三厅决定就此编印一部《日寇暴行实录》。由于香港有较好的印刷条件,叶浅予就带着这批照片从武汉来到香港。到香港后,他和丁聪住在一起。丁聪帮他画版样、编画报,直到印装成册。

《日寇暴行实录》的成品,由叶浅予护送运回内地。但没有料到,赶上了1938年11月12日“长沙大火”。结果这批书大部分被烧毁了。于是,叶浅予第二次来到香港,组织抗日宣传。

因为上海沦陷,《良友》画报被迫停刊。1938年底,马国亮、李青、丁聪等《良友》人,便在香港编印出版了《大地》画报,编辑部设在中央戏院二层。

叶浅予第二次来到香港,根据国民政府的安排,筹备出版了一本名叫《今日中国》的对外宣传画报,用英、俄、法、中四种文字印刷。他到香港后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大地》画报便把编辑部的一角让给《今日中国》。两个编辑部朝夕相处,丁聪也就近参与了《今日中国》的办刊工作。在办刊的同时,叶浅予还出面组织画家创作抗日宣传画。他们买来许多白布,裁成一米多长的布块,发给香港的本地画家和相当一批来自内地的画家。丁聪白天编画报,晚上不仅自己参与创作,也帮

助叶浅予联系画家。

1939年4月,画作收集上来以后,叶浅予、丁聪等人组织举办了上面提到的抗战画展。预展期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和中国记者金仲华一起来参观。过了不几天,宋庆龄也来看了展览。显然,宋庆龄是在听到斯诺、爱泼斯坦和金仲华的评价后,才决定来到这里的。吸引宋庆龄的《逃亡》,正是丁聪创作、展出的几幅作品之一。

1937年以前,宋庆龄一直住在上海。对于这位大名鼎鼎的“国母”,丁聪十分崇敬,但一直无缘谋面。这次,宋庆龄专门邀请这位年轻画家与她见面、交谈,还特地与丁聪、版画家陈烟桥一起,在画作《逃亡》前合影。

后来,《逃亡》由保卫中国同盟用10元钱买下。丁聪说,这个钱他根本没有接到手里,而是直接捐给保卫中国同盟了。

(摘自人民网 本文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宋庆龄在丁聪画作《逃亡》前留影

名义上都是所谓国军,却常常连军饷也不发,军火、装备也不管。我父亲不得不自筹粮饷,货轮便是自筹收入的一部分。全靠自筹粮饷,我父亲的部队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才不致被中央军统统吃掉。”

没想到是最后一面

1958年,人民日报社记者站和新华社分社合并,傅冬调到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傅冬也受到很大冲击,她给周总理写信,总理下令保护,她才逃过浩劫。

“文革”结束,傅冬同志又回到人民日报社记者部,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她告诉我,她想收集材料,为她父亲写一部真实的传记。我举双手赞成。

1984年,傅冬同志调新华社香港分社担任编辑部副主任。上世纪90年代,她回到北京,身体一直不好。我曾到崇文门她住的地方去看她。她见到我很高兴,忙着问一些老同志的情况。我问她,傅作义将军的传记写好了吗?她沉默了很久,慢慢说:“困难太大,写不下去。”我说:“你先写个草稿也好,留给后人作为宝贵资料。”她苦笑着说:“不必了吧,这事不能勉强。其实,想开了,写什么传记?现在,回忆录成灾了吧,有多少人看?值得费那么大的劲吗?”我很不以为然:“傅将军的一生是很值得写的,是军事史、政治史的宝贵材料……”她打断我的话:“茶已凉了,要不要我给你冲点热水。”我知道她不愿谈这事,便也就算了。不料,这竟是和她的最后一面。

富有才华、忠心耿耿、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傅冬同志,就这样悄悄走了。

(金凤/文 摘编自《炎黄春秋》)

尘封解密

傅冬窃取父亲傅作义的情报:用巧克力收买小弟弟

著名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长女、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傅冬同志(原名傅冬菊)在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为我党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傅冬当年是如何进行地下工作的,又是如何说服父亲傅作义投诚的?具体细节很少有人知道。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和傅冬同志同为人民日报社记者。在共事的一段日子里,傅冬跟我讲述了当年她从事地下工作时的这段神秘往事……

通过几块巧克力获取重要情报

1951年,傅冬同志到人民日报社当记者。我清楚地记得,她梳着两条长辫子,上身穿一件白布衬衫,下穿灰布裤子,脚上是白袜黑布鞋,衣着十分朴素。

1951年夏天,抗美援朝运动已在全国蓬勃开展。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安岗同志派我和傅冬同志去北京市东城区,调查总结一下一个市区如何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

当时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我和傅冬住在东城区政府一个十分简陋的招待所。一间小平房,两张木板单人床,两张三屉桌,两把椅子,一个脸盆等,这些是住房的全部陈设。我们成天奔走在炎炎烈日下。在东城区调查一个多月,两人很谈得来。我早就听说,作为傅作义将军的长女和爱女,傅冬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利用她的特殊身份,为解放战争做了许多贡献。出于记者职业的好奇,我请她谈谈当时的情况。她笑说:“没啥好谈的,我只是奉命工作吧。”我坚持道:“不会这么简单吧。你不妨讲几件有代表意义的事。现在,全国解放了,许多事无须保密了吧。”

傅冬点点头。我们坐在小院内,暑

热已退,凉风阵阵。她侃侃而谈,我凝神细听,十分闲适。

她谈到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党中央急需了解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和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傅作义将军是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经常去南京开会,自然了解蒋介石的全面部署。傅冬这时在天津《大公报》副刊工作,常回北平看望父亲。她是和晋察冀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直接联系的。刘仁同志此时要她从傅作义将军那里取得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情报。

傅冬知道在她父亲的寝室,有一个陈旧的保险柜。傅作义将军最重要的材料,都锁在这个保险柜里。傅将军开保险柜时,并不避开女儿。傅冬已经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但保险柜的钥匙,装在傅将军的上衣口袋里,随身携带,晚上放在他枕头底下。怎样才能拿到这把钥匙呢?

傅冬有一个五岁的小弟弟,是她父亲的至爱。傅冬买了几块当时还很少见的巧克力,送给小弟弟,让他从父亲上衣口袋取出这把钥匙交给她。小弟弟平时很听大姐姐的话,满口答应大姐姐的要求。傅将军下班回家,小弟弟爬到父亲怀里,要父亲讲故事,乘机拿走父亲上衣口袋里的钥匙,交给傅冬。

傅作义将军上班开会去了,傅冬进了父亲的卧室,用密码和钥匙打开保险柜。她拿起照相机,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她把钥匙还给小弟弟,让他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小弟弟照办了,傅冬又送他几块巧克力,并且和他牵手拉钩,让小弟弟保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

胶卷很快送到刘仁同志手中,转报党中央。这是解放战争最重要的军事情报。

听完这段话,我对傅冬说:“你好险啊,万一你父亲发现了,怎么办?”傅

冬温婉地笑说:“最坚强的人身上也会有软肋,我父亲的软肋就是小弟弟。他再疲劳,小弟弟一扑到他身上,他的烦闷全消了。我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啊!”

劝服父亲和平解放北平

夜已深了,小院中凉风习习,暑意全消。傅冬又谈了她为和平解放北平所做的工

作。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势如破竹。中央军委决定,一部分四野部队秘密入关,进行平津战役。不久,刘仁同志又派人到天津,指示傅冬立即回北平和傅作义将军住在一起,以便随时可以做她父亲的工作,同时向地下党组织及时报告傅将军的情况和心态变化等等。

当时,24岁的傅冬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回到北平她父亲身边,积极做傅将军的工作。她明确劝告父亲,不要再跟蒋介石走了。傅将军问女儿:“是聂荣臻派你来的?还是毛泽东派你来的?”傅冬事先已经得到党组织的指示,明确告诉傅将军,她是“毛主席派来的”。傅将军又问她:“你是共产党吗?”傅冬说:“我的家庭出身这样坏,共产党能要我吗?我不过是替共产党跑跑腿而已。”

傅作义将军虽有和谈之心,但顾虑重重,犹豫不定,难下真正的决心。傅冬耐心劝他:“你不是投降共产党,是和平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北平那么多名胜古迹,你舍得破坏吗?那可是要落下千秋骂名的呀!”傅将军低头不语,女儿的话,似乎真正触动了他的心灵。如果故宫、天坛毁在他手中,他怎能对得起后代子孙,对得起国人?

傅冬将傅作义将军每天的言谈、神态、情绪变化等等及时报告地下党

组织,地下党通过秘密电台向天津前线司令部报告,为司令部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后来,聂荣臻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此事,高度评价了北平地下党和傅冬同志的作用。

傅作义两艘货轮的来龙去脉

当年,我和傅冬同志在东城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两人合写了调查报告,又各自写了一篇人物专访。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傅冬同志和我依然互相往来。一次,我问她,最近回家看过傅将军吗?她说,回去过,发现她父亲心神不定,有心事的样子。她关心地问,有什么心事吗?傅作义将军(时任水利部部长)叹了口气,告诉她有这样一件事。原来,一解放,傅作义将军就把他家不动产包括一座花园全捐给国家了,花园后来成了幼儿园,他很高兴。只是,还有从天津开向上海的两艘货轮,没有交出去。因为,有一些旧部属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困难,总来找他。他不得不靠这两艘货轮的收入,接济他们。只是,这几天他想来想去,总觉得不妥。

傅冬劝父亲:“应当将这两艘货轮交出。旧时的一些部下生活有困难,应当劝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学会节俭度日,向老百姓看齐。”傅作义将军听了点头答应。他告诉傅冬,他这就给李富春副总理写信,交出两艘货轮,了却一桩心事。傅冬笑笑对父亲说:“俗话说,无官一身轻。我看,无财也一身轻嘛。”父女两人高兴得大笑起来。

我听了这事,对傅冬说:“看起来,你父亲依然很信任你,有事总找你商量。只是,我不明白,你父亲怎么会拥有两艘货轮呢?”傅冬说:“当年蒋介石一直排斥异己,歧视并打击地方部队。